

# 北平社会调查所以对清宫档案的整理与研究<sup>\*</sup>

## ——基于学术转型视角的考察

沈 博

**内容提要:**清宫所存明清档案的发现,对于经济史研究在近代中国的成型具有重要意义。在“新史学”潮流背景下,随着新旧史学转型引发学界对档案价值的重新定位,北平社会调查所较早意识到清宫档案中的财政经济材料对于清代经济史研究的重要价值,率先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对其进行抄录和整理,为学界留下了数量庞大且文献价值颇高的清代财政类钞档。依托社会科学研究的职业素养,以汤象龙为首的北平社会调查所学人将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引入对清宫档案的整理和研究工作中,确立了中国经济史研究社会科学范式的根基,让传统“食货之学”真正转变为现代意义的经济史研究。北平社会调查所基于清宫档案的经济史研究,直接反映了这种学术转型,折射出现代的中国经济史研究在构建阶段的社会科学化路向及其与史学路径底色之间的内在关联。

**关键词:**北平社会调查所 清宫档案 经济史研究 社会科学化路向 史学路径

### 一、引言

殷商甲骨文、居延汉简、敦煌遗书和清宫所存的明清档案,被公认为20世纪初中国古文献的“四大发现”。它们的出土与公开助推着“新史学”在近代中国学界的深化,力促史学研究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其中,传统“食货之学”同样在新材料和新观念的涌现与融合中,逐渐向现代学术趋向转型和汇流,并在20世纪30年代真正成长为独立的中国经济史学科。<sup>①</sup>脱胎于清宫档案<sup>②</sup>,由北平社会调查所在20世纪30年代初整理形成的清代财政类钞档,正是这一重大转型背景下形成的重要产物。

以往学界对于中国经济史研究在20世纪30年代出现的现代转型的关注,较多聚焦于中国社会史大论战的催生和形塑作用,将探讨重点置于大论战前后曝光度颇高的唯物史观派和

[作者简介] 沈博,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北京,100836,邮箱:jjsshbenbo@cass.org.cn。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藏清代财政类钞档整理与研究”(批准号:22VLS009)阶段性成果之一。

① 关于中国经济史学研究的萌芽与形成问题的讨论,可参见李根蟠:《二十世纪的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历史研究》1999年第3期;李根蟠:《中国经济史学百年历程与走向》,《经济学动态》2001年第5期;李伯重:《回顾与展望: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百年沧桑》,《文史哲》2008年第1期。

② 作为近代中国古文献“四大发现”之一的明清档案,主要指清宫保存的明清各部门的内部档案和清代的外交档案,包括内阁大库档案、军机处档案、内务府档案、宗人府档案等。有鉴于北平社会调查所学人整理和研究的经济类材料以清宫所藏的清代各档案为主,本文称之为“清宫档案”。

食货派。<sup>①</sup>但实际上,活跃于当时国内经济史坛的研究力量并不只有这两派,还包括北平社会调查所<sup>②</sup>的一批经济史学研究者。相较于深度参与论战的另外两派,北平社会调查所的经济史学人及其创办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由于其研究背景、议题、范式等方面的原因,与社会形态问题论战的中心相距甚远,以致在当时国内经济史学界中“影响并不怎么大”。<sup>③</sup>不过,如果从纯粹的近代中国学术转型的视角来看,北平社会调查所的经济史研究实则走在当时国内学界的前沿。就在时人批评论战陷入滥用理论、忽视史料时,北平社会调查所在汤象龙等人的带领下,投入清宫档案的整理和研究工作中,切实将搜集和发掘新史料、引入和运用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的“新史学”潮流带入经济史研究,推进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经济史学研究的科学化路向,确立了中国经济史学研究社会科学范式的根基。

目前,尽管学界在梳理和探讨中国经济史学的形成和发展问题时,都会高屋建瓴式地论及北平社会调查所以对清代经济史研究的重要贡献,<sup>④</sup>但相关专题性研究却相对少见,<sup>⑤</sup>也甚少明确且系统地深究北平社会调查所以对清宫档案的整理和研究工作,<sup>⑥</sup>尤其是基于官方文书档案在新旧史学中的特殊性角色,注意到该整理研究工作直接反映的传统“食货之学”向现代意义经济史学转型的历史线索,以及与之关联的中国经济史学的构建路径问题。事实上,由于经济史学属于经济学和历史学的交叉学科,如何缓解和协调经济史学研究中史学路径和社会科学化路向之间的内在张力,时至今日

① 关于中国社会史论战催生和形塑中国经济史学的专题讨论,可参见何兹全:《我所认识到的唯物史观和中国社会史研究的联系》,《高校理论战线》2002年第1期;陈峰:《从食货之学到社会经济史——社会史论战对中国经济史学的催生和形塑》,《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0年第3期;陈峰:《民国史学的转折——中国社会史论战研究(1927—1937)》,山东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等等。有关唯物史观派、马克思主义史学与中国社会史论战的关系的讨论,可参见叶桂生、刘茂林:《中国社会史论战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形成》,《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1期;罗梅君:《政治与科学之间的历史编纂:30和4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形成》,孙立新译,山东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李根蟠:《唯物史观与中国经济史学的形成》,《河北学刊》2002年第3期;阿里夫·德里克:《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翁贺凯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张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与社会史论战》,《近代史研究》2021年第5期;左玉河:《中国社会史论战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崛起》,《历史研究》2022年第2期;等等。关于食货派对中国经济史学研究的影响与贡献,可参见李源涛:《20世纪30年代的食货派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河北学刊》2001年第5期;向燕南、尹静:《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拓荒与奠基——陶希圣创办〈食货〉的史学意义》,《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阮兴:《〈食货〉与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经济社会史学界》,《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5年第2期;洪认清:《〈食货〉半月刊在经济史学理论领域的学术贡献》,《史学史研究》2007年第4期;等等。

② 因为北平社会调查所于1934年7月并入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所以本文在谈及并入前的情形时,以北平社会调查所与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分别指代两个不同机构;在讨论并入后的情形时,则统一称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此外,北平社会调查所在1926年7月1日成立之时,是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会下属的社会调查部。迨至1929年7月1日,北平社会调查部被改组为社会调查所。因此,本文在论及1926年7月至1929年7月1日的情形时,仍用北平社会调查部,在论及1929年7月至1934年7月的情形时,则改用北平社会调查所。汤象龙领衔的团队整理和研究清宫档案的时段,主要集中于北平社会调查所时期,并延续至合并后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阶段,直至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迫使工作中止。

③ 陈啸江:《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总成绩及其待决的问题——献给开始研究本问题的朋友们》,《社会科学论丛》第3卷第1期(1937年)。

④ 参见李根蟠:《中国经济史学形成和发展三题》,侯建新主编:《经济—社会史:历史研究的新方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88—106页;李伯重:《回顾与展望: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百年沧桑》,《文史哲》2008年第1期;吴敏超:《筌路蓝缕启山林: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兰州学刊》2014年第11期;杨祖义:《20世纪的中国经济史学》,经济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11—113页;高超群、黄英伟:《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挑战与机遇刍议》,《历史教学》2017年第24期;朱浒:《20世纪以来清代经济史研究的范式演变及其前景》,《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0年第4期;陈峰、李自强:《民国时期中国经济史构建的史学路径》,《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22年第5期;等等。

⑤ 比如,李自强聚焦于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的经济史研究特色,庾向芳梳理了北平社会调查所以对清代经济史研究的开创性贡献,但他们均未论及清宫档案在新旧史学中的角色差异,以及由之带来的传统“食货之学”与北平社会调查所经济史学之间的新旧学术差异。参见李自强:《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学院派”——以民国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所为中心的考察》,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2015年;庾向芳:《北平社会调查所以对清代经济史研究的开创性贡献》,《上海经济研究》2020年第9期。

⑥ 梁义群、赵彦昌和陈聪等曾专门探讨汤象龙等人对明清档案的整理情况,但他们仅介绍了汤象龙团队对清宫档案的整理过程,并未深究整理工作背后隐含的中国经济史研究的转型问题。参见梁义群:《清代档案与三十年代的经济史研究》,《史学史研究》1996年第1期;赵彦昌、陈聪:《汤象龙与明清档案》,《山东档案》2011年第6期。

仍是困扰中国经济史学界的一个重要问题。<sup>①</sup> 有鉴于此,深入发掘北平社会调查所对清宫档案的整理与研究,揭开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藏清代财政类钞档的产生过程,将有助于学界更加全面地认识中国经济史学的转型轨迹,更好理解中国经济史学自建构伊始就存在的史学路径与社会科学化路向的内在张力问题。

## 二、“新史学”潮流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兴起

中国传统史学素有“食货之学”的传统。<sup>②</sup> 正史中的《食货志》、记载历代典章制度沿革的会要与会典等政书,乃至各类农书、工书、地方志等,都包含着丰富的经济史资料,是后人了解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重要依据。然而,在鸦片战争后,随着西学东渐之风日盛,文史哲不分的中国传统知识体系开始在西方近代学术思想的冲击下走向瓦解。而“食货之学”传统的瓦解及其近代学术转型,至少可部分上溯至梁启超倡导的“新史学”革命。梁启超主张,应注重发掘史学的致用性,“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sup>③</sup> 历史观的进化论底色与历史书写的社会取向,使得社会经济专题开始进入史家的研究视野。尤其是在欧洲实证史学潮流的影响下,实证化和科学化迅速成为20世纪初中国史学研究的重要价值取向。随着殷商甲骨文、敦煌和西域各地出土的简牍、敦煌千佛洞所藏的六朝和唐代遗书等新材料陆续被发现,以王国维、顾颉刚、胡适、傅斯年、陈寅恪等为代表的史料派依循求真的科学理念,希望借鉴自然科学中的实验程序与方法,对史料进行科学的搜集、整理、考订与辨伪,以更好地完成对于事实和证据的归纳整理。在这一背景下,档案、考古遗迹等第一手史料的价值随着史学观念的转型而提升。史学与新史料的结合构成了当时中国史学的一大发展趋向。

不过,在近代中国社会内忧外患的现实背景下,求真与致用的内在张力始终未曾消缓。除了史料考据的自然科学化路向外,史学走向科学化的学术转型还包括了自梁启超倡议“新史学”伊始就出现的史学与现实紧密结合的社会科学化路向。不同于史料的搜集与考证能在一定程度上从训诂考据的经学传统中获益,社会科学化路向的发展还需以现代社会科学的形式与依托。迨至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前后,各类研究机构和学术组织的成立、专职研究群体的出现、学术期刊的创办、分科教育模式和现代高等教育体制的确立等等,才使得现代社会科学在中国初步完成了学科制度化的构建,现代社会科学的理论和研究范式才开始真正扎根于中国学术界。尤其是唯物史观在当时中国思想界的流行,以及由之引发的社会史大论战,使得社会经济议题被摆到了史学研究中更耀眼的位置,强化了历史学与社会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之间的交织关联:“以经济为中心纵着考察社会变革的,为历史学;对于历史学,横着考察社会的,推马克思的意思,那便是经济学,同时亦是社会学。”<sup>④</sup> 这让当时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和思考历史发展的内在经济动因。而经济学科在这一时期的快速发展,则为这一探索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和方法支持。北京大学、燕京大学等先后成立经济学系,中国经济学社等专门学术组织的创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下文简称“中研院社科所”或“社会科

① 相关讨论可参见吴承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1期;吴承明:《谈谈经济史研究方法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2005年第1期;孙圣民:《历史计量学五十年——经济学和史学范式的冲突、融合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孙圣民:《对国内经济史研究中经济学范式应用的思考》,《历史研究》2016年第1期;高超群、黄英伟:《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挑战与机遇议》,《历史教学》2017年第24期;杜恂诚:《论中国的经济史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关系》,《中国经济史研究》2019年第5期;高超群:《从学科分野看经济史研究现状与未来》,《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11月21日,第5版;等等。

② 关于从传统“食货之学”到现代意义的经济史学的转型过程,可参见李根蟠:《中国经济史学形成和发展三题》,侯建新编:《经济-社会史:历史研究的新方向》,第86—106页;李伯重:《回顾与展望: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百年沧桑》,《文史哲》2008年第1期;吴敏超:《筌路蓝缕启山林: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兰州学刊》2014年第11期;等等。

③ 梁启超:《中国史叙论》,《清议报》第90期(1901年)。

④ 李大钊:《史学要义》,《史学要论》,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84页。

学研究所”)专设经济组等等,都表明了中国经济学研究力量的兴起。中国经济史学正是凭此历史际遇,真正发展成一门独立学科。史学研究的社会科学化路向也随之获得了实质性发展。

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底色的唯物史观派,以《食货》半月刊为阵地的食货派,以及依托清宫档案进行近代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北平社会调查所学人群体,是推动现代意义的中国经济史学走向成型的三股重要力量。尽管三派的关注视野、研究进路和学术主张各有侧重,但他们都致力于将社会科学理论或方法引入经济史学的研究中。相比于唯物史观派和食货派,北平社会调查所由于未曾深度参与社会史大论战,其经济史学研究工作所获得的关注相对有限。但这并不意味着北平社会调查所在近代中国经济史学形成过程中无所作为。事实上,在当时中国社会科学界盛行的“侧重实地调查和资料整理”<sup>①</sup>的学术潮流中,成立于1926年7月的北平社会调查部,就以“探溯社会问题之根源,参诸外国之先例,聘请海内专攻社会经济学科之人士,俾获用其所学,从事科学的社会调查研究”为发展宗旨,<sup>②</sup>在具有深厚经济学或社会学理论功底和研究素养的陶孟和、李景汉、樊弘等的引领下,迅速成为当时国内社会调查领域的研究重镇。基于对资料和数据敏锐的北平社会调查所的学人们沿着对现实问题做历史溯源的探索进路,充分注意到了清宫档案的价值。正是凭借深厚的社会科学背景,以及对大规模、成系统的清宫档案的整理与利用,北平社会调查所在当时中国经济史研究潮流中,形成了颇为鲜明的治学方法和学术特色。

一是在资料上,率先系统性地使用政府档案,直接凸显传统“食货之学”向现代意义经济史学的转变。在传统“食货之学”中,人们重视的往往是食货志、政书、农书等文献,这些文献通常也是早期的近代中国经济史研究重点关注和发掘的对象。北平社会调查所则敏锐地注意到清宫档案的重要价值,并对其进行系统整理和科学分析,而不再像传统“食货之学”那样,局限于对具体经济制度或事件经过的记录与描述。就此而言,北平社会调查所对清宫档案的整理与研究,直观呈现了传统“食货之学”与现代意义的经济史学之间的一大关键差异。

二是在研究重心上,北平社会调查所的研究多聚焦于明清时期的财政、货币、盐务、海关等议题,具有鲜明的现实关怀和问题意识导向,彰显出中国经济史学致用功能的一面。清宫档案文献数量庞大,牵涉的研究话题相当广泛,北平社会调查所学人对于档案的选择性抄录,以及对研究专题的选定,都表明了引导他们整理和研究工作的问题意识。他们对于明清经济史议题的关注,多受到现实问题的影响,从而将关注视角聚焦于相对宏大、具有前后历史关联的议题。因而,这既有别于食货派自下而上的研究进路,又不同于唯物史观派聚焦于长时段历史宏大议题动因阐释的研究风格。需指出的是,由于清宫档案材料的特性,北平社会调查所的经济史研究多着眼于明清时期国家、政府层面的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忽视了对历史中普通平民的关注。毕竟,北平社会调查所开展的社会调查对象,正是普通民众。

三是在研究范式上,依循实证分析思路,将经济学、社会学、统计学等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引入对经济史料的整理解读与对经济史问题的分析解释之中。北平社会调查所经济史学人虽然关注档案中的资料和数据,但他们并不满足于历史学家所习惯的多线程推进、最终因果关系分散的叙事描述,而是运用社会科学所偏好的结构性思维,尝试以特定的理论和方法,从这些纷繁复杂的文字和数据中,厘清他们所认为的因果关系中最重要的关键环节及其内在的动力学解释。北平社会调查所经济史研究的社会科学化路向,不仅贯穿于问题的解释分析中,还影响到他们以选择性辑录、编制统计表格等方式整理和发掘史料的思路 and 策略。

四是在研究进路上,北平社会调查所的经济史学人走向了以专题为凝聚点,以史料为基础,以经

① 方显廷:《民元来我国之经济研究》,《银行周报》第31卷第4—5期(1947年)。

②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社会调查部报告》,《教育杂志》第19卷第10号(1927年)。

济学、社会学、统计学等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为分析工具的学术研究路径。丰富且翔实的清宫档案,既为他们运用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提供了助益,也使得他们认识到史料的重要性,由此更为清晰地意识到经济史研究的史学化路径和社会科学化路向之间的内在张力及其互动互鉴的潜在空间,进而强化了他们关于资料与方法并举的主张。

### 三、清宫档案的公开与清代财政类钞档的由来

尽管经济史研究在 20 世纪 20 年代末 30 年代初之时,已日益受到学界关注,但促使素以社会调查研究为志向的北平社会调查所将研究触角伸向经济史领域的直接动因,是内阁大库档案等清宫档案公开带来的新契机。

#### (一) 内阁大库档案的公开与整理

根据王国维的说法,内阁大库收藏的材料,十分之三为书籍,十分之七是档案。其中,书籍多是“明文渊阁之遗”,档案则“有历朝政府所奉之朱谕,臣工缴进之敕谕、批折、黄本、题本、奏本,外藩属国之表章,历科殿试之大卷”。<sup>①</sup> 尽管内阁大库保存的文献材料众多,但却鲜有翻阅和利用者,“三百年来,除舍人、省吏循例编目外,学士、大夫罕有窥其美富者”。<sup>②</sup>

民国初年部分内阁大库档案流落民间。宣统初年,因内阁大库年久失修、亟需修缮,库内一部分档案被移至文华殿,所藏书籍被转移到京师图书馆,剩下的档案则被收藏于国子监的南学和学部大堂的后楼。民国初年,放置在国子监南学和学部大堂后楼的这批档案被移交至新成立的国立历史博物馆。由于长期与世隔绝,世人并不清楚这批档案的存在,国立历史博物馆也未意识到其价值。1921 年冬,国立历史博物馆苦于经费短绌,在向北洋政府请示后,拣选出部分成色较好的档案,将余下部分捆绑打包,分两批贱卖给当时的纸商。1922 年 2 月,罗振玉无意中在北京街市上看到洪承畴揭帖和高丽国王的贡物表,认出这些都是大库遗物。于是,他一路追踪,并最终在两万块大洋的高价,从同懋增南纸文具店老板手中购得差点被化成纸浆的 8000 麻袋<sup>③</sup>档案。“八千麻袋事件”后,罗振玉着手推进这些档案的整理工作,将其中部分要件汇编出版,是为东方学会在 1924 年印行的《史料丛刊初编》。王国维在应罗振玉之邀而作的《库书楼记》中,将这批档案的发现列为当时中国四大“新出之史料”之一,高度肯定了这批档案的价值。

罗振玉购买故宫旧档一事在学界引发连锁效应。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下文简称“中研院史语所”或“历史语言研究所”)等学术机构开始参与搜集和整理工作。蔡元培向北洋政府教育部递交了将清代内阁档案转拨给北京大学的申请。他在呈文中谈及了这批档案的史料价值:“教育部历史博物馆收藏明末及清代内阁档案,如奏本、誊黄、报消册、试卷等甚夥,皆为清代历史真确可贵之材料。世人于此,均欲先睹以为快。”<sup>④</sup> 教育部旋即批复,同意将国立历史博物馆所藏剩余清宫档案移交给北京大学。<sup>⑤</sup> 在蔡元培和沈兼士、胡适、李大钊等学者讨论后,北京大学迅速组建整理档案会,并在《北京大学日刊》持续发布档案整理进展情况,分类刊布重要档案信息。随后,成立于 1925 年 10 月的故宫博物院,延续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整理档案的理路,在草创之初便设

① 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学衡》第 45 期(1925 年)。

② 王国维:《库书楼记》,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主编:《王国维文存》,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721 页。

③ 按王国维的《库书楼记》所言,罗振玉购得旧档案的数量是“九千袋、十五万斤”。赵泉澄的《北京大学所藏档案的分析》(《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第 2 卷第 2 期,1934 年)一文亦从“九千袋”之说。但目前的常见说法是 8000 麻袋。

④ 《请将清内阁档案拨为北大史学材料呈》(1922 年 5 月 12 日),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 4 卷,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621 页。

⑤ 根据沈兼士的说法,1922 年 6 月 17 日,国立历史博物馆移交给北大的档案共计 61 箱 1502 袋,但并未包含国立历史博物院已编目的殿试卷及其他材料,只是高准“将草目借与本校钞一副本”。参见《研究所主任沈兼士先生致校长函》,《北京大学日刊》第 1056 期(1922 年 6 月 19 日),第 2—3 版。

立了文献馆,接收、汇集和整理宗人府、军机处等其他清宫档案。此外,在蔡元培的斡旋和协助下,中研院史语所于1928年从李盛铎手中购得一部分“八千麻袋”内阁大库档案,并组织专人,陆续整理和出版《明清史料》。通过初步的搜集、整理和出版,这批清宫旧档案逐渐为学界所知悉。

## (二)北平社会调查所以对清宫档案的认知与抄录工作的开展

随着清宫档案中部分重要材料被陆续刊布,其中包含的“食货之学”材料,开始得到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关注。对数据和资料极为敏锐的北平社会调查所学人亦注意到,清宫档案中大量关于财政、金融、物价等的记录,对清代经济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于是,北平社会调查所与当时保管清宫档案的各机构联系,取得了整理内阁奏折的机会。自1930年10月起,北平社会调查所开始组织人手,前往故宫博物院文献馆、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和中研院史语所等处,抄录史料。依托于清宫档案的清代经济史研究工作,被正式写入社会调查所的年度工作报告,成为社会调查所的重要工作内容,<sup>①</sup>以“冀于二百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状况,作一有系统之研究”。<sup>②</sup>具体而言,北平社会调查所从事清代经济史整理与研究的动机主要有以下三方面:一是“因研究现在中国之诸种经济社会问题和现象往往必须涉及数十年或数百年前之经济事实,而异常感受材料上之缺乏与困难”;二是鉴于当时国内社会科学研究者仅关注现实问题本身,忽视“问题或现象所由成的过去”,而“本所认定过去必须与现在并重而同时研究,始可得到完满和正确的结果”;三是鉴于清代经济对当时中国经济社会问题研究的极端重要性,尽管当时国内关于清代经济的研究著述日渐增多,但“能以科学方法或从原始材料研究的尤少”。<sup>③</sup>

北平社会调查所这种由现实关怀引发的对于历史议题追溯的思想意识,并非一时兴起,而是在此前就已初显端倪。时任北平社会调查所所长的陶孟和,曾于1920年在北京高师附属中学教育研究会进行一次有关“新史学”话题的演讲。在演说中,除了谈及对“新史学”的认知及其对历史研究社会科学化路线的认可,他还基于进化论的思路,指出历史研究的现实意义:“现代与过去相衔接。明古代过去之事,即可帮助我们明白我们的现在,我们自身和我们同胞,明白人类现在的问题和将来的希望。”相比于傅斯年等人以新材料和考证方法拓展史学视野的志向,陶孟和对史学之“新”的理解,与他强调社会调查的内在理路颇为相近,即更偏重于对当下事实的把握:“要求明白现在的情形和现任的思想,须先知道他们有怎样的经过。过去的事实说明现状何以如此。历史研究的,不是过去的事实若何,是怎样会产出那样的事实。”<sup>④</sup>这一由现实入史的思路,亦可从当时国内社会科学研究所涉足经济史领域话题的现象中窥知一二。南开大学教授、中研院社科所经济学组特约研究员何廉在20世纪20年代末研究中国对外贸易问题时,搜集和编制了1867—1927年的进出口物量指数、物价指数和物物交易指数。<sup>⑤</sup>杨端六则在《六十五年来中国国际贸易统计》一书的序言中谈到:“自从国民政府成立以来,中央及各省各市政府……所注意的大都在于现今经过的事实而不曾注意到已经过去的历史。这固然是他们所处的环境使然,但我们研究经济学的人不仅对于现在和将来的事情应该设法探讨其真相,就是对于已往的历史也须得搜求充分的确实材料以为比较研究的基础。”<sup>⑥</sup>北平社会调查所在关注现实经济状况时,就尤为注重对过往数据和资料的搜集与整理。《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的发刊词提到,北平社会调查所“自开始工作以来,无论研究任何问题,时时感到经济

① 《社会调查所第五年度报告》在述及“本年度新进行之工作”时,第一项正是“清代经济史之研究”。参见北平社会调查所编印:《社会调查所第五年度报告》,1931年印行。

② 北平社会调查所编印:《社会调查所概况》,1933年印行,第8页。

③ 汤象龙:《道光朝捐监之统计》,《社会科学杂志》(北平)第2卷第4期(1931年)。

④ 陶孟和:《新历史》,《新青年》第8卷第1期(1920年)。

⑤ 当时何廉还是北平社会调查所委员会的成员之一。参见北平社会调查所编印:《社会调查所第四年度报告》,1930年印行;北平社会调查所编印:《社会调查所第五年度报告》;北平社会调查所编印:《社会调查所第六年度报告》,1932年印行,第9b页。

⑥ 杨端六等:《六十五年来中国国际贸易统计》,《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专刊》第4号(1931年)。

史的研究的不可少。于是便注意于经济史料,尤其是近代经济史料的搜集”。<sup>①</sup>

抄录和整理工作,主要由北平社会调查所第一位专事近代经济史研究的研究员汤象龙主导推进。汤象龙先是于1930年被招收为北平社会调查所的首届研究生,专攻清代经济史,直接参与清宫档案经济类文献的抄录工作。一年期满后,他被北平社会调查所聘用为研究员。实际上,汤象龙在清华大学求学时,便在本科生导师梁启超、研究生导师罗家伦<sup>②</sup>的引导下,选择将近代经济史作为研究方向。在他们的影响下,汤象龙对重视史料搜集与科学考证、将社会科学理论引入史学研究的“新史学”抱有极高的热情,并对近代史议题和清宫档案予以高度关注。他认为,档案是研究中国近代史最宝贵的资料之一,“档案是从前政府多少年遗留下来而未曾发表过的文件。其中有许多关系历史中各种重要问题的材料”,对于经济史而言,“里面可以得到许多关于国家财政和人民经济的统计”。<sup>③</sup>事实上,在开始整理清宫档案之前,汤象龙有感于当时出现的金贵银贱现象,以《东华续录》《夷务始末记》《大清会典》等辑录的清代文献为基础,完成了对道光年间银贵问题的研究。<sup>④</sup>这为他后续的清代经济史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他深知清宫档案对于清代经济史研究的重要价值:“这些档案要算是研究中国近代财政、经济、社会、法律的头等资料……其中虽不是每字每句都千真万确的绝对的可靠,可是根据这些资料,我们可以改正以往许多书籍上的错误。”<sup>⑤</sup>这种认识正与陶孟和的想法不谋而合。<sup>⑥</sup>于是,陶孟和对汤象龙发掘清宫档案中财政经济史料的工作颇为支持。除了加强人手配备、支持成立中国近代经济史组外,陶孟和还将全所半数以上的经费拨付给这一项目。

根据北平社会调查所起初的计划,自1930年开始的清代经济史研究工作,预计十年完成,拟分两期进行。第一期计划用四年时间搜集史料,同时进行初步整理工作;第二期计划用六年时间,先集中进行各种经济问题和现象的专题研究,再“继以全部问题和现象之探讨”。<sup>⑦</sup>至于搜集的目标史料,主要包括官书政书、私人集著、清代档案和外国书籍四种,<sup>⑧</sup>其中尤以清代档案为要。由于故宫博物院所藏的清代军机处档案“较其他各处所藏者有系统有条理”,<sup>⑨</sup>经与故宫博物院文献馆联系和协商后,北平社会调查所开始派遣一批具备经济史知识和文学功底,且训练有素的抄写员,前去抄录由汤象龙挑选出的各类档案。在对已抄录的每批材料进行检查验收后,汤象龙利用晚上的时间,再从这些抄录材料中摘录重要信息,形成资料卡。到1932年8月时,北平社会调查所已摘抄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等五朝各省督抚的折片超过10万件,内容涉及钱粮、粮价、厘金、盐税、漕项、耗羨、参票等十数类。

由于需抄录的档案数量庞大,为节省时间和人力起见,汤象龙团队并非完全抄录原件内容,而是

① 《发刊词:人类是有长久的过去的动物》,《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第1卷第1期(1932年)。

② 罗家伦曾提到近代史研究背后潜藏的现实关怀:“要知人类或民族过去的来历和演进,现在的地位和环境,以及他将来的生存和发展,都非研究他近代的历史不可。”至于近代史研究的材料,他同样论及清宫档案的价值:“就以中国近代史而论,除了民间社会的材料而外,就是政府的文件,最大部分也是公开的,如‘内阁大库挡[档]案’‘军机处挡[档]案’等等,都分藏在故宫博物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和北京大学等处,可以自由参考。从总理衙门、外务部、外交部一贯下来的挡[档]案,都有钞挡[档]可以调阅。”参见罗家伦:《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意义和方法》,《国立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第2卷第1期(1931年)。

③ 汤象龙:《谕折汇存及华制存考》,《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第1卷第1期(1932年)。

④ 汤象龙:《道光时期的银贵问题》,《社会科学杂志》(北平)第1卷第3期(1930年)。

⑤ 汤象龙:《对于研究中国经济史的一点认识》,《食货半月刊》第1卷第5期(1935年)。

⑥ 当时陶孟和认为,“经济史的研究工作是社会科学中一门新兴的学科,应该大力发展”,而发掘清宫档案的工作是“研究中国近代财政经济史工作中的‘开金矿’。”参见汤象龙:《自序》,《中国近代海关税收和分配统计(1861—1910)》,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6页。

⑦ 汤象龙:《道光朝捐监之统计》,《社会科学杂志》第2卷第4期(1931年)。但《社会调查所第五年度报告》中提到第一期计划是三年。

⑧ 除钞档材料外,当时北平社会调查所还搜集了3000多种有关中国近代财政经济的专门书籍。

⑨ 汤象龙:《道光朝捐监之统计》,《社会科学杂志》(北平)第2卷第4期(1931年)。

根据材料具体情况,“或用表格填写,或用节略方法作有系统有计划之搜集”。<sup>①</sup>其中,运用历史统计方法,以统计表格的形式整理档案中“一些有定期的、系统的、计量的政府报告和报销册”,<sup>②</sup>大致可占到抄录材料总数的2/3。<sup>③</sup>这在注重搜集和考证史料原件的当时,堪称创新之举。譬如,在搜集海关税收的史料时,汤象龙基于清代的统计制度,事先编制相对简明的统计表格,要求受过培训的抄录员<sup>④</sup>将海关每年每季报销册中的旧管、新收、开除、实在四项的具体数据,录入印好的统计表格,再汇编成相对系统的统计资料,如此既可减少抄录员的工作量,又能为研究人员提供便利。到1932年6月时,北平社会调查所已录得关税、厘金、灾情等十余种统计表格。

随着抄录的资料和统计表格不断增加,自社会调查所第六年度(1931年7月至1932年6月)起,汤象龙团队开始对已有材料编制索引编目。为了更好地整理和查阅已抄录的材料,汤象龙专门设计了索引卡片,将内容提要、资料来源、抄录人员姓名、抄录时间等信息誊写于软卡和硬卡上。其中,软卡附在资料上,记有资料分类目录的硬卡则装入专制的卡片盒,以便于研究人员检索。

在抄录之余,北平社会调查所还注意到了数量庞大的清代报销黄册。自1933年10月起,北平社会调查所开始派人前去抄录北京大学和故宫博物院所藏的清代汉文黄册。到1934年6月之前,抄录团队共抄得户、礼、工、兵四部及各省钱粮报销册1200册。<sup>⑤</sup>与此同时,北平社会调查所还派人前去抄录中研院史语所所藏的报销册。

1934年7月北平社会调查所和中研院社科所正式合并后,汤象龙转而成为社会科学研究所的助理员,但抄录工作并未因此中断,对经济史研究颇为看重的社会科学研究所继续支持这项工作。到1935年6月,抄录团队又从故宫博物院和北京大学两处抄出地丁、银库、漕白、盐课、兵马钱粮等项的报销黄册3700余本,从历史语言研究所处抄得各县易知由单300余件。<sup>⑥</sup>此外,社会科学研究所还专门从历史语言研究所借到了清代钱粮黄册2379册。1935年7月,抄录团队完成了对北京大学所藏报销黄册的整理和抄录工作,并于当年9月起着手整理和抄录北大所藏的题本。1935年12月,完成了对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所藏报销黄册的摘录工作。社会科学所发布的年度报告显示,从1935年7月到1936年6月,从以上两处抄录的钱粮、户口、官俸、杂税、盐课、关税等项报销册共计1265本,户口、田赋、关税、杂税、钱粮、军饷、驿站、通商、河工等类的题本、奏折和揭帖等共计8290余件。<sup>⑦</sup>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抄录工作被迫中止。

自1930年10月到1937年9月,汤象龙领衔的抄录团队历时7年,先后耗费约20万元,从故宫博物院文献馆、北京大学、中研院史语所等处所藏的上百万件档案中,抄录了超过12万件档案,由此形成了清代财政经济史研究的宝贵资料库。<sup>⑧</sup>这批材料,正是目前收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清代财政类钞档,成为该所的“镇所之宝”。<sup>⑨</sup>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批钞档越发显现出珍贵的文献价值。一方面,它相对系统地集合与保留了大量清宫档案中经济类文献的抄写本,能在一定程度

① 单士元:《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所藏档案的分析》,《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第2卷第2期(1934年)。

② 汤象龙:《自序》,《中国近代海关税收和分配统计(1861—1910)》,第6页。

③ 北平社会调查所编印:《社会调查所第六年度报告》,第2a页。

④ 根据汤象龙的说法,当时负责摘录海关数据的人员,主要是高易滋、董宜之、李煦、史久庚四人。

⑤ 北平社会调查所编印:《社会调查所第八年度报告》,1934年印行,第1b页。

⑥ 《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二十三年度报告》,国立中央研究院文书处编:《国立中央研究院二十三年度总报告》,国立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1935年印行,第142页。

⑦ 《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二十四年度报告》,国立中央研究院文书处编:《国立中央研究院二十四年度总报告》,国立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1936年印行,第145页。

⑧ 汤象龙:《关于加速整理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藏抄档的意见》,汤象龙研究室编:《中国经济史学科主要奠基人:汤象龙先生百年诞辰文集》,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12页。

⑨ 李根蟠:《开创功 未尽才》,汤象龙研究室编:《中国经济史学科主要奠基人:汤象龙先生百年诞辰文集》,第22页。



上弥补清宫档案由于后来战争动乱而出现的材料分散各处、<sup>①</sup>甚至是部分遗失的缺憾；另一方面，在整理中完成的大量统计表格、索引编目、分类装订等前期工作，在相当程度上为后来经济史学人进一步系统整理和利用清宫档案提供了便利。<sup>②</sup>

#### 四、北平社会调查所以对清宫档案的初步研究

北平社会调查所的同仁们基于已搜集和整理的档案材料，同步推进清代经济史的专题研究，在20世纪30年代初步形成了一批具有学术价值和影响力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以档案等第一手史料为基础，大胆运用经济学理论和统计学方法进行分析，引领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新风尚，推动经济史研究的社会科学化路向，让当时刚刚成型的经济史学科大放异彩。

##### （一）围绕清宫档案整理开展的研究工作

北平社会调查所的清代经济史研究，可追溯至1930年7月汤象龙加入北平社会调查所。随后，北平社会调查所陆续引进专职研究人员。1932年中国近代经济史组成立之时，汤象龙、罗玉东、刘隽已成为清代经济史研究的中坚力量。汤象龙担任组长，负责协调全组研究事务。1934年3月，梁方仲加入经济史组，进一步壮大了经济史研究队伍的力量。此外，曾在北平社会调查所攻读经济史方向研究生的杨熙龄、周益湘等人，都参与了清宫档案的整理和研究工作。

北平社会调查所的经济史研究工作，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围绕清宫档案展开的。相比于此前整理和筛选清宫档案中较有研究价值的原件材料汇编出版的做法，研究团队采取了结合档案整理实况确定专题研究、材料整理与问题研究同步推进的行动策略，“所得资料中凡能单独成一有系统的研究题目且系轻而易举者尽先整理研究”。<sup>③</sup> 汤象龙团队率先整理出一批关税、厘金、灾情等方面的材料。这为研究人员开展研究提供了极大便利。1931年，汤象龙根据业已整理的统计数据，就道光时期的捐监银问题进行探究，撰文《道光朝捐监之统计》发表于北平社会调查所主办的《社会科学杂志》第2卷第4期。随后，汤象龙将研究目光转向清宫档案中数量丰富的关税材料，希望通过系统整理从咸丰末年至宣统时期各省督抚、各海关监督关于海关税收报告的7000余件档案材料，对晚清五十年的海关税收和分配进行统计，分析各海关历年税收情形及其用途。不过，由于按照新分类标准进一步整理海关统计资料的工作相当庞杂且耗时，又不巧在统计工作刚完成时就赶上卢沟桥事变，原本筹划出版的《清季五十年海关税收及其用途》终未能如期完成。但其前期研究成果《民国以前关税担保之外债》（《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第3卷第1期，1935年）、《光绪三十年粤海关的改革》（《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第3卷第1期，1935年）、《民国以前的赔款是如何偿付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第3卷第2期，1935年）等已公开发表，为后来《中国近代海关税收和分配统计（1860—1910）》的最终成稿奠定了坚实基础。

除关税研究外，自1932年起，北平社会调查所经济史团队开始推进晚清厘金、盐务、粮价、田赋等方面的专题研究。汤象龙等人意识到，历史的范围实在太广，“全真的历史是求不到的”，因此只能通过分工，使得研究范围缩小和研究题目专门化，进而更好地“集中精力寻觅他所需要的史料”，“以长久的研究的经验”，“对于所寻到的史料与以适当的评价，去利用他”。<sup>④</sup> 有鉴于此，北平社会调查

① 目前，除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下文简称“一史馆”）收藏有1000多万件明清档案外，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有宫中档奏折约15.86万件、军机处档折件约19.09万册、军机处档册6218册、内阁部院档2027册、史馆档约2.3万件、杂档506册，以及各类官书约1.4万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则藏有4000余件明代文书和30余万件清代档册。

② 以一史馆为例，在所藏的1000多万件明清档案中，截至2023年7月1日，可在线搜索的档案目录仅约421.3万条，可供学界查阅的还不到一半。而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藏钞档中部分经过筛选的抄件内容，尚在一史馆档案未整理或开放之列，正可弥补这一缺憾。

③ 北平社会调查所编印：《社会调查所第六年报告》，第2a、2b页。

④ 编者：《导言》，《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第2卷第2期（1934年）。

所采用专人负责专题研究的方式开展工作。罗玉东结合当时已初步整理成型的清代厘金材料和数据,致力于清代厘金问题的研究。在利用故宫文献馆的档案及《清文献通考》等文献材料,完成对清代厘金制度起源及其理论分析的考察后,罗玉东进一步结合2000余件清代各省厘金报告,尝试整理和统计清代各省厘金数额,“研究其用途分配以考察其与财政之关系”。<sup>①</sup>最终,罗玉东在1934年秋完成其经典之作《中国厘金史》,并于193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刘隽则利用从故宫文献馆处抄录的档案和《清盐法志》等文献材料,按照盐区研究晚清以来的盐务弊端与盐政改革问题,并在1932—1933年先后完成并发表了《道光朝两淮废引改票始末》(《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第1卷第2期,1933年)、《清代云南的盐务》(《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第2卷第1期,1933年)、《咸丰以后两淮之票法》(《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第2卷第1期,1933年)等文章。1934年初进入北平社会调查所的吴铎<sup>②</sup>起初以近代长芦盐政为研究选题,但后来于1935年11月在《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第3卷第2期)上发表了《川盐官运之始末》一文。此外,周益湘根据业已整理的闽海关监督报告中有关中琉贸易的材料和数据,从贸易数量、商品类别、进口货物税率、往来船只数目等方面,就道光朝之后中国与琉球的贸易情况进行研究,相应成果《道光以后中琉贸易的统计》发表于《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第1卷第1期(1932年)。陈文进<sup>③</sup>根据清宫档案中有关总理衙门及出使各国使领的经费收支材料,完成并发表了《清代之总理衙门及其经费(1861—1884)》(《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第1卷第1期,1932年)、《清季出使各国使领经费(1875—1911)》(《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第1卷第2期,1933年)等文章。实际上,北平社会调查所还曾依据内阁大库和军机处档案中各省每月粮价报告、钱粮档册等材料,制定了研究道光之后的盐务、晚清九十年全国粮价的变迁、清代田赋史等议题的计划。但因整理和研究工作上的种种变动,相关研究成果未能公开发表。<sup>④</sup>

依托于清宫档案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北平社会调查所在1932年11月创办了近代中国第一份以“经济史”命名的学术刊物《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这份集刊的创办堪称当时“中国学术界研究近代经济史的创举”。<sup>⑤</sup>集刊创办的初衷在于向学界同仁披露包括清宫档案在内的各类经济史资料的整理和研究成果:“现在我们希望就着所能得的资料,无论题目大小,都陆续的整理发表,以就正于经济史的同志。本集刊便是披露整理结果的定期刊物。”<sup>⑥</sup>除了刊载北平社会调查所及其他学术机构经济史学人的研究文章外,刊物的史料、书评栏目亦多刊载与清宫档案或清代经济史研究议题相关的内容。集刊之所以专辟史料专栏或发布档案专号,一方面是向学界表明,北平社会调查所的经济史研究工作是依照方法与资料相结合的方式,“根据事实说一切的话”,另一方面则希望引起更多人对清宫档案的关注和兴趣,“去作同样的研求”。<sup>⑦</sup>集刊曾于1934年刊出“明清档案专号”,邀请中

① 《研究中国近代财政经济史之两著作(预告)》,《社会科学杂志》(北平)第4卷第1期(1933年)。

② 根据《社会调查所概况》的记录,吴铎被分在“劳动问题”组。参见北平社会调查所编:《社会调查所概况》,第6页。

③ 北平社会调查所的资料显示,陈文进是北平社会调查所的统计员,在与社会科学研究所合并后,担任统计管理员,直至1935年6月停职。1935—1936年,他曾和刘人鉴一起协助汤象龙,编制各海关历年税收和分配的关别统计,以及全国海关历年税收和分配的总数统计。参见汤象龙:《自序》,《中国近代海关税收和分配统计(1861—1910)》,第7页。

④ 据《社会调查所第七年报告》的介绍,自1932年起,北平社会调查所开始利用抄录到的2万余件清代各省每月粮价报告,“研究过去粮价之变迁,并考察当时人民经济生活之程度”。参见北平社会调查所编印:《社会调查所第七年报告》,第2a页。不过,报告并未言明研究负责人,后续也未见相关成果发表。有关近代中国盐税的统计工作亦出现类似情况。此外,梁方仲在进入北平社会调查所之初,本计划利用清代各省钱粮档册、军机处档案及其他书籍文献,研究清代田赋问题。后因他转向明代经济史研究,关于清代田赋史的研究成果亦未见发表。据汤象龙的说法,研究团队还曾结合2000件左右的各省布政使报告,整理并形成“清季(1821—1911)各省田赋统计”。参见汤象龙在“文革”中致中科院院长郭沫若的信,汤象龙研究室编:《中国经济史学科主要奠基人:汤象龙先生百年诞辰文集》,第317—319页。

⑤ 《广告词:社会调查所出版 陶孟和 汤象龙主编 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第2卷第1期(1933年)。

⑥ 《发刊词》,《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第1卷第1期(1932年)。

⑦ 《史料参考》,《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第1卷第1期(1932年)。

研院史语所的徐中舒、北京大学的赵泉澄、清华大学的吴晗和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的单士元等人,撰文介绍各单位所藏清宫档案的基本内容及整理情况,突出强调“在史料极端贫乏的中国里,档案实在有他的无与伦比的价值,尤其是在研究近代财政经济的方面”。<sup>①</sup>除了档案介绍外,书评专栏也多是北平社会调查所同仁对当时一批颇具研究价值的经济史料汇编或研究专著的介绍和评述,包括与盐政研究相关的《盐法通志》(周庆云纂辑,文明书局1914年版)、《清盐法志》(张茂炯编纂,财政部盐务署1920年印行)、《东三省盐法志》[陈为镒等纂,奉天盐运司宣统三年(1911)印行],与清代厘金研究相关的《湖南厘务汇纂》[但湘良编,光绪十五年(1889)刻本],与清代史料汇编相关的《达衷集》(许地山编,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谕折汇存》、《华制存考》,<sup>②</sup>以及海外经济史研究著作 *Principles of Money Applied to the Present State of the Coin of Bengal* (Sir James Steuart Bart, London, 1772)、*The Cost of Living in Sweden 1860—1930* (by the staff of the Institute for Social Sciences, University of Stockholm, P. S. King & Son. Ltd., c. 1933—1937)等。

## (二) 研究工作的社会科学化路向

北平社会调查所在20世纪30年代对清宫档案的整理与研究,在当时中国经济史学界掀起了研究新风尚,导引着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新转向。清宫档案本是“政府所保存的当时人关于当时事件的记载或报告”。<sup>③</sup>若在传统官修史学的体系中,这些档案中的财政经济资料,终将以固定的编撰形式和体例,被概要地编入史书或各类专书,成为“食货之学”的一部分。然而,面对同样的档案材料,北平社会调查所完全打破了“食货之学”的传统,不再只是注重对过往经济制度沿革与经济现象的简要纪实,而是提升以档案为典型的第一手史料在历史知识生成过程中的价值定位,将现代科学研究的问题意识、理论和方法注入对史料的解读与历史事实的再现和重构中。尽管二者的基础材料和研究议题有相同之处,但研究成果的表现形态、生成路径及其目标关怀,却截然不同。新旧史学范式的转变引发了学界对档案价值的再定位,<sup>④</sup>由再定位引致的对档案的新利用也加速了新旧史学范式的更迭。由此可见,北平社会调查所对清宫档案中财政和经济类材料的整理、抄录和研究,实则是传统“食货之学”真正走向现代经济史研究的一个直接而典型的表征。

不过,转型的关键并非在于清宫档案,而在于隐藏在清宫档案整理和研究工作中的社会科学化路向。相比于传统“食货之学”,现代经济史学不仅要描述和记录过去的经济现象,还要对这些现象进行科学的研究。<sup>⑤</sup>若就此标准而言,北平社会调查所早已对现代意义的经济史研究形成了清晰而准确的认知:“我们以为一切经济史的叙述必须根据事实,不可凭空臆度,所采用的方法应与研究其他的严格的科学无异。”<sup>⑥</sup>在他们看来,所谓的方法,便是以经济学、统计学为典型的现代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事实上,他们也注意到了现代社会科学与历史之间的紧密关联:“社会科学的大部分都是历史的说法固然未免过于夸大,但是社会科学的研究的确离不开历史,却是不容否认的,而且自从各种社会科学发展以来,向来所公认的历史的范围逐渐扩大,包括人类生活的各方面而形成所谓文化史或社会史或分演成为个别的社会制度史,也是人所共见的事实。”<sup>⑦</sup>更重要的是,“无论任何现而且

① 编者:《导言》,《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第2卷第2期(1934年)。

② 《谕折汇存》和《华制存考》皆为晚清内阁邸抄的汇总。《谕折汇存》的发刊时间无从查考,“就我们搜到的材料说,最早的是同治十三年”,光绪三十三年九月停刊;《华制存考》自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开始发刊,可被视为《谕折汇存》的“替身或接续物”。参见汤象龙:《谕折汇存及华制存考》,《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第1卷第1期(1932年)。

③ 编者:《导言》,《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第2卷第2期(1934年)。

④ 相关讨论可参见杨培娜、申斌:《清代政府档案的价值认知与整理方法的变迁》,《档案学通讯》2021年第3期。

⑤ 李伯重:《回顾与展望: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百年沧桑》,《文史哲》2008年第1期。

⑥ 《史料参考》,《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第1卷第1期(1932年)。

⑦ 《发刊词》,《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第1卷第1期(1932年)。

近的社会事实,都是由他那过去而且远的社会事实,一点一滴的变来的。”<sup>①</sup>这一看法清晰呈现了北平社会调查所由社会科学研究切入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学术发展路径。

就研究选题的类别而言,这一时期北平社会调查所经济史研究工作的意识意识和现实关怀亦相当鲜明。从各人研究成果看,汤象龙重点关注清代的货币、财政、海关等方面的议题;罗玉东主攻清代厘金史研究;刘隽聚焦于清代盐务问题。整体而言,这些议题仍属于传统“食货之学”的关注范畴。但之所以关注这些议题,一方面固然与清宫档案的材料特点相关,另一方面亦有其强烈的现实关怀。财政、货币、海关、盐务等问题,都是当时社会经济研究的重要议题。刘隽在研究道光时期两淮废引改票的盐务改革时就提到,“当此国人注意盐政改革之际,相信此项盐务历史事实,颇有研究之必要。”<sup>②</sup>

北平社会调查所的经济史学人在接触清宫档案时,便能更自觉地将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引入整理和研究工作中,由此真正确立了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社会科学范式根基。尽管自梁启超开始,“新史学”一直在追求科学化,但对于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工具的应用,却仍多停留于口号之中。北平社会调查所则基于其社会调查和经济统计的研究传统,对经济资料中的数据极为敏感,认为“独有经济事实是具体的可以用量计的,如财富、生活、消费、户口、租税,都可以一定的单位与一定的数目表出”。所以,汤象龙等人主张,“经济史所运用的资料必求精确的量的记载。”<sup>③</sup>在整理和研究清宫档案时,他们尽量运用经济学、统计学等方法,让潜藏于档案中的历史信息以直观的数据和统计表格显现,一改当时以搜集、整理和考证史料为主的史学研究潮流。大量统计表格的列示,成为北平社会调查所经济史研究团队研究论著的一大特色。此外,社会科学的理论研究素养也让他们倾向于对历史材料进行理论性的抽象分析和提炼总结,而不只是满足于对新史料的排比罗列。譬如,罗玉东基于“大凡一制度之得以存在,常有一种理论与之相伴。苟非出于制度之先,为之奠基础,则必产生于其后,为之作后盾”的理论认知,结合税负转嫁的理论分析,梳理和总结了清代厘金制度从创行之初的“以筹饷缺源为号召”到后来以“征商”之说为理论根基的转变脉络。<sup>④</sup>刘隽结合租税理论,将场征税制解读为制造额课税法或生产课税法,系统总结了道光时期两淮盐务废引改票中就场征税派和票法派的观点,发掘出当时两淮盐务变革背后的思想理论逻辑。<sup>⑤</sup>迨至北平社会调查所与中研院社科所合并后,浓郁的社会科学研究氛围使得援社会科学理论方法入史的研究进路得以进一步延续。

相比于当时同样主张援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入史的唯物史观派和食货派,北平社会调查所亦有其鲜明特点。罗玉东的《中国厘金史》,便在分析方法、理论运用等层面,彰显着定量与定性研究兼顾、形式论证与据实纪事相融、解释性话语与描述性话语共存、方法与资料并举的学术风格和研究特色。<sup>⑥</sup>在研究方法上,统计表格丰富、以数据论事是北平社会调查所经济史研究成果的一大典型特征。《中国厘金史》充分运用统计等方法,编制了128个大小表格,以数字语言和表格形式直观而详细地呈现不同省份厘金收支各项的结构特征及其发展趋向。出于对科学求真精神的贯彻,罗玉东在书中不厌其烦地交代了数据的处理过程。对于各地货币单位不统一的问题,罗玉东利用各省厘报的数据信息,计算或借用特定省份的库平银折合比率,以便于使各省厘金收支总数能进行统一计算和比较。对全国厘金总数,罗玉东采用估计的方式,在得到档案相对齐全的14省厘金总数的基础上,以其大致占90%的比例推算全国厘金收支总数。至于14省档案中出现的个别年份数据缺失,罗玉

① 樊弘:《社会调查方法》,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第20页。

② 刘隽:《道光朝两淮废引改票始末》,《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第1卷第2期(1933年)。

③ 《发刊词》,《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第1卷第1期(1932年)。

④ 罗玉东:《厘金制度之起源及其理论》,《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第1卷第1期(1932年)。

⑤ 刘隽:《道光朝两淮废引改票始末》,《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第1卷第2期(1933年)。

⑥ 虽说《中国厘金史》的正式付印时间是北平社会调查所并入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后的1935年4月,但该书写作始自1932年7月,并在1934年秋天完成,因此也算是北平社会调查所时期经济史研究的代表性成果。

东则采用线性插补法等方式处理,即“将缺报告年份的上下相邻二年的数目相加起来,取其平均数以补入缺报告的年份,如缺一年即补一年,缺数年即补数年。此为原则,如遇有特殊情形时,所用之方法亦略有变通,总以能近于实数为要”。<sup>①</sup> 为了保证插补法的科学性,罗玉东还对包含插补值的省份历年厘金收支数据进行误差限度的分析。此外,罗玉东不仅关注绝对值的变化,还关注相对值的变动趋向,利用所掌握的数据,进一步计算了捐纳银占户部收入银数的比重、新旧税率变动幅度等,据此揭示数据背后隐含的深层次问题。在理论分析层面,不同于唯物史观派以高度形式化的概念和理论解释宏大历史问题,也不同于食货派以现代社会科学的概念编织起相对零散的社会经济史料,北平社会调查所学人将社会科学的概念与理论意识渗入对具体问题的论证与分析中。虽然《中国厘金史》大量篇幅都在以传统的历史叙述方式阐述各省厘金制度沿革,但其行文间却也显示出罗玉东结合现代社会科学的概念或理论分析的痕迹。比如,在介绍雷以誠创行厘金时,罗玉东借鉴从量税、从价税的经济学概念,指出坐厘在原则上以从价为标准,但因纳税的日用品和必需品数量多且日常价值变动小,实际上有一大部分改行从量抽厘,据此区分不同货物的抽厘税率。在分析厘金和不平等条约的关系时,罗玉东聚焦于厘税的税负转嫁及其导致的贸易条件的变化,指出厘金对我国民族工商业发展的消极影响。在研究进路上,罗玉东对晚清厘金制度的历史溯源也充分表明了北平社会调查所由现实入史的研究思路,即不仅关注经济制度产生的近因,还注重对远因的追溯。就厘金制度的研究而言,罗玉东认为厘金制度的产生与当时清政府的财政状况密切相关,但清代财政在咸丰朝之前“大部分主要税收皆缺乏扩张性”,<sup>②</sup>实已隐含着厘金制度在财政状况困窘时兴起的必然性。这充分彰显了社会科学家分析社会现象时惯有的结构性思维,以及对社会经济现象背后的历史必然性的认知。

### (三) 研究工作的史学路径倾向

北平社会调查所对于经济史研究的社会科学范式的推进,并不意味着他们排斥史学路径,哪怕后来被并入社会科学气氛更为浓厚的中研院社科所。汤象龙曾谈到,经济史作为一门交叉学科,“一方牵扯到纵的历史,而一方牵扯到横的经济社会各方面”。在汤象龙看来,当时经济史研究“最要的仍是搜集资料”。<sup>③</sup> 相比之下,社会科学理论和分析方法的引入反倒并非最为急迫之事。毕竟,清宫档案并非经济史料的全部,不能满足整个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史料需求。理论和方法的运用,要以丰富详实的史料为基础,否则“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在后来评议张荫麟的《北宋的土地分配与社会骚动》一文时,汤象龙指出,尽管量化分析在经济史研究中是“有用且有价值的一种方法”,但也是存在“它的应用限度”。毕竟,不同于通过一定科学方法和统计原理获得的现代经济数据,“见诸历史的量的资料,大都不外官厅行政所用的记载或时人认为有意义的数字”,未必能够符合现代意义的统计学要求,因此并不能对这些数据资料的用处“估量过高”。<sup>④</sup> 正因如此,后续中国经济史研究终究是偏向史学路径,多以史料的搜集与考据为主,以确保在相对真实的经济事实中开展研究。由此反观清宫档案的整理和抄录工作,实则为北平社会调查所的经济史研究解决了最基础的史料难题。正如汤象龙所言,尽管清宫档案“不能说每一个字每一个数目都是千真万确的,但不可否认这种资料的可靠程度在近真的历史的意义上是极高的”,<sup>⑤</sup>这就使得北平社会调查所经济史学人们不用过多顾虑史料的辨伪和考订,而可以更好发挥他们的专长,推动中国经济史研究社会科学范式的成型。在他们的研究理念中,史料是经济史研究的基础,问题意识是推动他们投身经济史研究的内在动力,社会科学

① 罗玉东:《中国厘金史》,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159页。

② 罗玉东:《中国厘金史》,第10页。

③ 汤象龙:《对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一点认识》,《食货》第1卷第5期(1935年)。

④ 张荫麟:《北宋的土地分配与社会骚动》(附汤象龙注),《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第6卷第1期(1939年)。

⑤ 《汤象龙/许涤新、严中平信稿》,汤象龙研究室编:《中国经济史学科主要奠基人:汤象龙先生百年诞辰文集》,第309页。

的理论和方法则是进行分析和解释的必要工具。

事实上,北平社会调查所之所以能在食货派之前,明确提出“方法”与“资料”对于经济史研究的重要性,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得益于其一脉相承的研究理路。对于当时的社会科学研究者而言,通过归纳方法发现社会现象背后的规律,是“创造社会科学的必要工作”。而要达致这一目标,就需要调查社会现象,尽可能多地接触和发掘社会事实。然而,时间和空间却使得一个整体的社会现象被“劈开成为那远与古的或是近与今的两方面”。对于“远与古的”事实,研究者只能通过现存的材料了解。但要“撇开那不可靠的部份,而直接获得那正确的历史事实”,就需要用“历史的方法”加以处理。所谓“历史的方法”,就是“用求实的态度,精密的心思,在现存的文件中,撇开那不可靠的材料,而寻求那事实的真象”,包括校勘、考订、分类、训诂、评判、决定特殊的事实等六种。<sup>①</sup>这意味着,在实证风气的影响下,北平社会调查所进行的社会科学化路向的经济史研究,本就存在着趋向史学路径的内在动力。经济史研究的社会科学化路向与史学路径并不矛盾,反而存在着对话与合作的潜在基础。

汤象龙、罗玉东、刘隽、梁方仲等人参与1934年5月成立的史学研究会的筹办和日常活动,则进一步表明了北平社会调查所经济史研究工作偏向史学路径的倾向。尽管史研究会极力鼓吹社会科学治史的研究路数,但其核心底色仍是历史学。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实属历史学的专门领域,而非直接发端于社会科学理论研究。在抽象的理论解释与具体的事实叙述的权衡之间,史研究会学人强调史料搜集和整理的基础性地位,而将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视为治史的辅助工具。

## 五、结语

正所谓“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sup>②</sup>清宫档案的新发现,对于中国经济史研究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真正成型具有重要意义。随着新旧史学转型引发学界对档案价值的再定位,以汤象龙为首的北平社会调查所经济史研究团队,较早关注到了清宫档案财政经济材料对于经济史研究的重要价值。北平社会调查所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从故宫博物院文献馆、北京大学、中研院史语所等处,整理和抄录了超过12万件的档案材料,形成了目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藏的清代财政类钞档,从而为清代经济史专题研究奠定了重要的文献基础,也为后来经济史学人利用清宫档案提供了便利。依托社会科学研究的素养,北平社会调查所将经济学、统计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引入到整理和研究工作中。尽管与当代经济史研究相比,北平社会调查所经济史研究对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的具体应用水平还相当有限,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工作推动了经济史研究的社会科学化路向,确立了中国经济史研究社会科学范式的根基,让传统“食货之学”真正转变为现代意义的经济史研究。以专题为中心,以清宫档案为基础史料,以经济学、统计学等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为分析工具,成为20世纪30年代初期北平社会调查所经济史研究的特色。

事实上,正因为文书档案在新旧史学范式转变中的特殊性,相比于唯物史观派和食货派,北平社会调查所的经济史研究,更直接且明确地彰显传统“食货之学”向现代意义经济史学的学术转型,折射出中国经济史研究在构建阶段的社会科学化路向,及其与史学路径底色之间的内在关联。在中国经济史学的形成过程中,唯物史观派很早就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方法,将社会科学化路向注入中国经济史研究中;食货派则依托《食货》半月刊的期刊阵地,在强调援社科理论方法入史的同时,主张扩大史料搜集范围,注重从社会经济层面解析中古中国的历史,确立了后来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基本范式。总的来说,唯物史观派和食货派分别奠定了后来中国经济史学的两大研究传统。相较于以上两派,北平社会调查所对清宫档案的整理与研究同样凸显着中国经济史学形成过程中的不同面

① 樊弘:《社会调查方法》,第18—23页。

② 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学衡》第45期(1925年)。

相:一是率先系统性地整理和利用清宫档案中的公文文书,丰富和发展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文献资料;二是具有鲜明的问题意识导向,往往是基于现实问题的历史追溯,集中于财政、货币、海关等专题研究,呈现出中国经济史学的“致用”面相;三是在实证分析思路的引导下,将经济学、统计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引入经济史料的整理与经济史问题的分析中,使中国经济史研究初步挣脱简单的客观现象描述或纯粹的理论分析解释的发展形态,展现着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社会科学化路向。北平社会调查所并入中研院社科所后,更强化了这一路向。

当然,社会科学化路向,仍是以档案材料的搜集和考订为基础。北平社会调查所的经济史研究依托清宫档案,反而更有利于发挥其社会科学专业背景的研究特长,从而率先形成一批颇具社会科学化特色的经济史研究成果,使其成为经济史研究社会科学范式成型的重要推动力。正因如此,他们相当重视经济史研究的资料基础,形成了资料与方法并重的研究主张。这也形塑了后来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经济史学研究者聚焦重要专题研究、援经济学理论方法入史、史料整理与理论分析两手抓的学术传统。

##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s Study on the Archives of Qing Pala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cademic Transformation**

*Shen Bo*

**Abstract:** The discovery of Ming and Qing Archives has been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birth of the discipline of economic History in modern China. In the context of “New History” trend, the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 was early to realize the value of the archives of Qing Dynasty for the study of economic history of Qing Dynasty, and took the lead in collation of the archives of Qing Dynasty. What's more, the scholars of the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 led by Tang Xianglong, applied the social science theories and methods to the collation and research of the archives, resulting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roots of the social science paradigm of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 research as well as the transition from the traditional “Shihuo” (食货) to economic history. The historical story of the collation and research of the archives of Qing dynasty by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 implies a direct clue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economic history, reflecting the social-science approach of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 research in its construction stage and its intrinsic connection with the undertones of the historical approach.

**Keywords:**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 Archives of Qing Dynasty Palace, Economic History Research, Social-Science Approach, Historical Approach

(责任编辑:高超群)